

L'UMANESIMO ITALIANO

意大利 人文主义

Eugenio Garin

〔意〕加林 著 李玉成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Eugenio Garin

L'UMANESIMO ITALIANO

意大利 人文主义

〔意〕加林 著 李玉成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Eugenio Garin
Der Italienische Humanismus
Verlag A. Francke AG., 19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人文主义/(意)加林著;李玉成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
ISBN 7-108-01090-9

I. 意… II. ①加… ②李… III. 人文主义学派-研究-
意大利 IV.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221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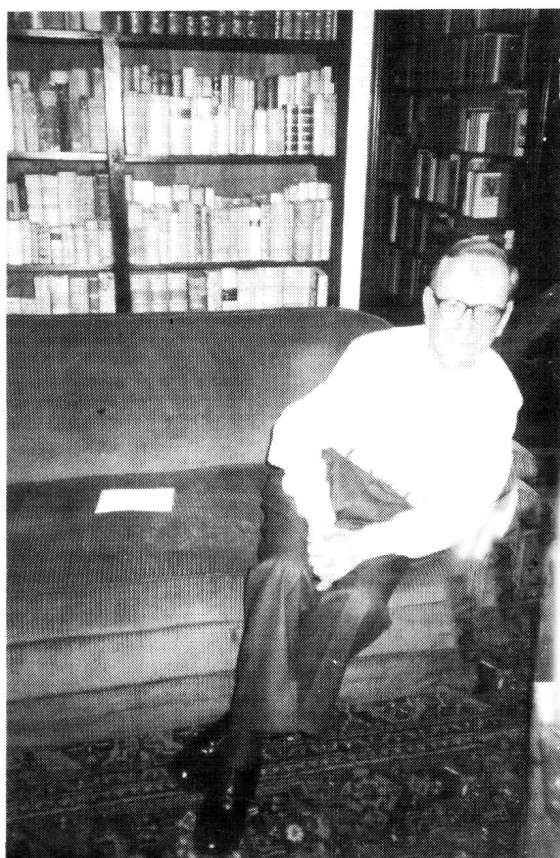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93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108-01090-9/B·184

定价 14.50 元



作者加林



作者加林和译者李玉成

译 序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近代世界的曙光在意大利升起的伟大时代。恩格斯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人文主义(I' Umanesimo)就是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它 14 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并作为一种思潮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之久,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I' Umanitarismo)的前身。人文主义的实质是早期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封建主义,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发动的一场革命。

在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着欧洲封建社会的全部文化。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宗教神学,教会的教条是一切思维的基础。当时只有一种类型的学校,即以训练僧侣为目的的学校,神学统治着哲学和科学。教会宣扬人一生下来就有罪,人生的幸福在死后的来世。《圣经》中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教会竭力劝诫人们说,要想死后上天堂,活着的时候就要禁欲修行,因为人世间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都是有罪的。因此,对科学和哲学的追求也被认为妨碍修行。这样,就使人民长期处于贫穷和愚昧的落后状态。

到了 12、13 世纪,欧洲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意大利由于地处地中海中部,扼守欧洲与东方贸易的要冲,工商业发展迅

速,成为当时欧洲最富庶的地区,资产阶级也首先在意大利登上历史舞台。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便利用大量的希腊、罗马出土文物和古代书籍中所颂扬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世主义精神来同封建统治以及教会的神权进行斗争,为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出现了世俗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神学学科”之外,还增设了以自然和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其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人文主义”这个称谓便由此而来。到14世纪下半叶,人文主义越出了学校的范围,在许多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如萨卢塔蒂、布鲁尼、布拉乔利尼、瓦拉和阿尔贝蒂等都在政府里担任了要职。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所在的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文主义者反对神主宰一切的观念,宣扬人是万物之本的思想,主张在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应当加强对人的研究。彼得拉克说:“上帝的世界是经过七层铅封的世界,非凡人智力所能理解”,“我不想变成上帝,……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还说:“我要问:对飞禽、走兽、鱼蛇的特性知道得很多,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不知我们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皮科洛米尼说:“我们是人,而不是天使。沉思默祷是一桩神圣的事情,而我们是人,这对我们不合适。……热心于学习的人往往只从物理、数学和形而上学方面获得知识,而扔下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学科,即我们借以掌

握生活的艺术——掌握通向德行和良好风尚之路的艺术的科学,只有这样的学科才会把我们引向快乐和幸福。”瓦拉说:“上帝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人,创造了包括灵魂和肉体的人。但这两个部分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属于魔鬼的。”菲莱尔福在1450年写的一封信中说:“我不明白,自从弄清楚人不仅仅是灵魂的时候开始,人们怎么可以忘记人的身体呢?……我们既然是大自然的产儿,就应当竭尽全力保持我们肢体的健美和完好,使我们的的心灵和身体免遭来自任何方面的伤害。”人文主义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在阿尔贝蒂和达·芬奇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批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人物。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这些大师手里,歌颂人及其现世生活的造型艺术在古希腊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峰。人文主义者反对以人的出身、门第来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强调个人奋斗,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应主要根据他的品德和才能来决定。

二、揭露教会的腐败,反对禁欲主义和隐逸生活。人文主义者颂扬尘世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但丁在《神曲》里把许多教皇和天主教主教打入地狱,让他所敬爱的“异教徒”诗人维吉尔做向导,引导他周游地狱和净界;让他青年时代所钟爱的情人贝雅特利采做向导,引导他游天堂,表现出对教会和禁欲主义的否定。薄伽丘在《十日谈》中辛辣地揭露了僧侣阶级的腐化和堕落。斯佩罗尼在《对话集》中说:“愚蠢的人们就在隐修中出生、成长并幸福地渡过毫无意义的一生。……人像上帝制造的一把剑,对于剑来说,不应当成天为自己沉思,而应当去战斗。”布鲁尼说:“孤独的善是极其令人忧伤的善。我们要通过把自己献身于别人而求得欢

乐。……那种沉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并无益处。”他还说：“我感到重温许多蠢人所犯过的错误是有好处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离群索居，无所事事，便不成其为学者……聪明睿智的人不需要这种折磨。……那些回避同人们交谈的人，我们只能说他们智力低下，并无学习的愿望。”布拉乔利尼写了一篇对话《论爱财》，他在其中说：“你们不要用那些无礼的、伪善的寄生虫来反对我，他们借口信奉宗教而四处游荡，寻找供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还向其他人说教要以贫为荣，鄙视财富。我们决不同这些蛆虫在一起建设城市，他们之所以能过悠闲自得的生活，正是由于占用了我们的劳动。”波焦认为，有人借口出于道德的考虑蔑视荣誉，实际上这种道德就是僧侣式的、孤僻的不会产生效果的和白费力气的道德，荣誉就是道德在其他人心中的反响，让其他人把你的行为当作范例和他们奋斗的目标。因此，完善和充实的道德是不可能同这种反响分开的。光荣几乎就是看得见的道德的社会闪光。阿尔贝蒂认为，道德最终将体现在“物质”、“金钱”和“财产”上。他说：“不要藐视财富，而要防止贪婪。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们会生活得愉快和自由。”他还说：“最大的爱就是爱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帕尔米耶里说：“没有钱花的人既不是自由的人，也不会风度翩翩。那些既没有政府工作的实践，又未曾为公众操劳过的孤僻的人是决不会有力量的……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道德的人应当追求财富，使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只要不损害别人，凭熟练的技艺增加自己财富的人是值得称颂的。”

三、人文主义者重视研究历史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人文主义者在古代的希腊罗马作品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世界，那里，崇尚人和自然，与中世纪崇尚神和禁欲主义的基督教

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人文主义者最早的活动是广泛搜寻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进行整理、翻译和研究。他们非常重视历史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萨卢塔蒂说:“从神圣的文献中摘出属于历史的部分,余下的部分中,当然还有非常神圣和极其优美的东西,但是……有时也并不那么使人惬意,从长远来看,它们不会给你带来好处。”他还说,由于手稿的残缺和失真,他在整理古代的著作时遇到了重重的困难。比如由于抄写者的粗心大意,旁注及行间注释者造成的错误,……加上那些涉及切身利益的文字被篡改的因素,在《圣经》和教皇的文件中,由于各种考虑而有意篡改了的文字,这样,经过各式各样的“野蛮人”的手之后就没有留下任何未经篡改过的伦理哲学、历史、甚至诗歌的原著。因此,需要把一部作品中令人生疑的地方集中起来,委托给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去处理,以恢复他们的本来面貌。人文主义者认为,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是通过对词句的推敲、辨明含义之精微,从被埋葬的世界中,从被时间夺走的一切光辉的陈迹中,重新复活前人生动的思想。因此,人文主义者非常重视历史。布鲁托说,历史在道义上的崇高地位在于它真实地、无情地、不受限制地反映了生活的面貌,不需我们对它作一般性的辩护。它无须任何人召唤,便把人类的渣滓从人类的永恒生活中抛出去。“世界的审判者是历史,她是唯一神圣和不朽的法官。”人文主义者强调要向前人学习。布鲁尼说,要习惯于同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对话,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同这些精灵进行对话,谦逊地倾听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割裂他们的思想,让人们的精神进入一个思想意识的社会。这些超越时间的人物组成一个“理想国”,我们的思想也就从这里汲取营养。他还说,应当按照过去的本来面目来理解过去,要用世俗的观点来理解现实,要

用人的观点来解释人们的历史。人文主义者重视向古人学习，但并不迷信古人的著作，瓦拉说：“这些作品之所以神圣，并不在于它们永远关闭了人们前进的道路，而是打开了人们前进的道路。”回到历史的真实中以后，亚里士多德已不再是“权威”，而和其他人一样，成为一位受自己所处时代限制的思想家。

四、人文主义者重视文学、语言学和修辞学。彼得拉克称文学为“心灵的文化”。他说，医生只不过是修理人体的“机械师”，医治人的心灵却要靠哲学家和文学家。维尔杰里奥说：“有什么比阅读和写作更令人愉快呢？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的事情和同未来的人谈话，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时间。”人类的精神通过文学得以发扬和扩散，在文学中可以聚积无限的财富，人们通过文学可以学会尊重他人的价值。文学在不断更新的对话中以高尚的方式教育人们如何在人的社会中生活。阿尔丰索认为，一位不懂文学的国王就像一头戴着王冠的驴。博纳科尔西把文学看作是一门研究人的“诚实的学科”，它是人们之间进行相互沟通的一个最广阔而又坚实的纽带。希皮奥内有一句名言：“在公务之余，从事一点文学的消遣。在我无所作为的时候，我也正在从事最伟大的工作。”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她敲开人们的心扉，唤醒沉睡的精神，给人们指出通向智慧之路。皮科洛夫尼在1444年写道：“文学在意大利繁荣起来，君主们去听诗歌朗诵并不感到耻辱，他们自己也写诗。但是在日耳曼人那里，君主们更关心的是马和狗，而不是诗人。因此他们也不懂艺术，他们死的时候也像自己的牲口一样，不会留下什么令人回忆的东西。”

人文主义者非常重视语言学和修辞学。瓦拉用“振动”来解释动词(Verbum)产生的由来，说明语言是一种纯粹的通讯工

具,是人的活动。萨卢塔蒂认为,要透过语言的外壳,在发掘消失在习惯中的词汇的真实价值,深入探讨语言的精神内涵。因为语言和事物是不可分的,是与事物同时产生的。语法学是深入研究任何精神科学的前提。他又说:“我们把修辞学归于爱神维纳斯管辖也不无道理,因为修辞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点燃人们心灵中的火焰。”波利齐亚诺认为,“有什么比通过你的语言劝说你的同胞们去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和改恶扬善、消灾避祸更有益和更富于成效呢?”彼得拉克说:人们所表达的语言,正是可以用来衡量产生这种语言的心灵的尺子。“语言并非是心灵的次要指标。”一个人把自己的言论表达出来,置于别人的检验之前,也就接受了某种规则,显示了某种态度。他还说:“灵魂卑劣的人,语言不会崇高。”人们正是在交谈中,用语言来具体衡量心灵深处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心情是混乱的,那么我们的内心和语言就必然会发生冲突。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会有崇高的修养,才会经常保持平静和安详……即使他不擅长辞令,也会表达出优美、明确和协调的语言。内在和外在、思想和言论,是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人文主义者非常崇拜西塞罗,推崇修辞学和雄辩术。斯佩罗尼说:演说家首先要找到真理,然后还要能够用“优美动听”的语言来说服他的听众,他要“善于在盛着良药的杯子边上涂上一层香甜的醇酒”。

五、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崇尚理性、智慧和从经验得来的知识。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家们的时代,也是科学家们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就。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东方及阿拉伯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探索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人们再不自盲目崇拜过去的权威。到了15世纪,意大利变成了欧洲最重

要的科学发明中心。哥白尼在意大利学习十年之久,他的“日心说”由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得以证明。伽利略还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定律”,而意大利的医学则对人体解剖和血液循环学说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文主义者把研究人和自然放在重要的地位,皮科说:“大自然和《圣经》是上帝写的两本书。这两本书用不同的语言写成,但其根本都同出一源。”他还说,并非是要用自然来取代上帝,但是自然的神圣性和完整性比上帝更重要,因为人的行为应当顺乎自然的规律。切萨尔皮诺认为,自然界是一个阶梯式的系列,每一级都自成体系,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值得重视,世界上并不存在羞愧难容的事物,“在自然界中没有令人唾弃的东西,就连最渺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神圣的价值。”兰迪诺说:那些从事事务活动的人当然会为人们带来福利,但是这种好处只是当时的,不能持续长久。而那些为揭露自然奥秘而献身的人却能为人类带来永远的好处。个人的行为随着自己的死亡而消逝,但他的思想却能世代相传,成为不朽直至永远。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并非顺利的,教会人士对人文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意大利哲学家庞波那齐对“灵魂不朽说”表示怀疑,他的著作被焚毁;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反对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他的著作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他被宗教裁判所烧死。此外,伽利略、康帕内拉因宣扬进步思想也受到教会迫害,康帕内拉曾被囚禁达27年之久。人文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更崇高的原因还在于,它不是依靠人的权威,而是建立在“逻辑进程”的基础之上。他们主张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来发现真理,并说“争论是真理的筛子”。人文主义者还重视从实践中学习,马基雅维里说:“当我聆听一位年长的智者不是根据他从哲学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而是根据

他从自己的经验,行为中学到的知识来谈论公共事务和文明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更使我愉快了,因为这才是真正学习的方式。”伽利略厌恶当古代的传声筒,达芬奇认为思想家们提出的箴言与现实不相符时,这些箴言也就失去了意义。

六、主张“爱人”和为祖国、社会作出贡献。彼得拉克说:我们不用担心岁月的流逝会使人们忘却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辛勤归于徒劳,“光阴如矢,岁月如流,多少世纪过去了,但是人们对德行的称颂永无止境,对邪恶的斗争永不会终结。在进行新的探索的道路上,人的聪明才智不会停滞不前。因此,我们是乐观的,我们的辛勤不会白费。多少年来,那些在世界的黎明中探索生活意义的人的辛劳没有白费。”“爱他人”,这就是激励着彼得拉克研究人文主义的动机,也是研究的目的。他说:“人”是与我们同在的,从思想上讲,即使我们独居避世也是如此。当古代先贤的至理名言,不仅回荡于我们的心中,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而且还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同他人相爱。皮科认为:“你爱人而不是被人认识的时候更为人所爱,因为被你爱的人也会爱你。”人文主义者还把“爱人”的思想发展为爱祖国和为民众服务。他们常引用西塞罗的名言:“对那些保卫、帮助祖国并使她强大的人,天堂里永远为他们保留着圣人的地位。”布鲁尼说:“在对人类生活所作的道德教诲中,最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那部分,因为它们涉及为所有人谋求幸福的问题。如果说为一个人争取幸福是件好事,那么为整个国家争取幸福不是更好吗?幸福覆盖的范围越广,这种幸福也就越神圣……”他还认为:“人是弱小的动物,仅靠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弥补自身的缺陷,只有置身于文明社会中才会使自己完善起来。”人文主义者强调,知识并不是孤立地存放在象牙塔里的

东西,“她抛弃了隐逸的生活,来到城市里,渴望造福于民众”。

人文主义者对新思想的传播和欧洲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运动诱发了宗教改革,开创了现代世俗国家的雏型,翻开了现代史的第一章。文学上严谨典雅的文风、艺术上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人文主义者对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如达芬奇、伽利略、哥白尼等)。在社会理论领域里,他们第一次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意大利康帕内拉,英国的莫尔)。人文主义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表达了资产阶级破除封建思想体系的精神桎梏,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但丁的这句名言被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当作了座右铭。

一百多年前瑞士学者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为文艺复兴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历了20世纪初的批判浪潮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综合。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中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有:汉斯·巴伦(Hans Banon),保尔·克里斯特勒(Paul Kristeller)和本书的作者欧金尼奥·加林(Eugenio Garin)等。他们被视为从战前到战后的在文艺复兴研究方面的桥梁。加林是意大利人,1909年出生于罗马附近的雷埃蒂(Rieti)。早年在佛罗伦萨大学任教,以后又转到比萨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一生主要从事文艺复兴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1937年他发表了

关于德拉·米兰德拉的专著,1947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意大利人文主义》,这是他长期辛勤研究的硕果,其中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15世纪的珍贵资料。此书很快被译成各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丹尼斯·哈伊在《近25年来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称这本书是战后研究文艺复兴的论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此后,加林出版的著作还有《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4到16世纪欧洲的教育》(1954年)、《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195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哲学文化》(1961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964年)、《1900—1943年意大利哲学编年史》(1955年)、《19和20世纪的意大利文化》(1962年)、《作为历史知识的哲学》(1959年)、《再生和革命》(1975年)、《生命的黄道带》(1976年)、《20世纪的哲学和科学》(1977年)。他编写的《15世纪拉丁文作家》(1952年)对《意大利文学:历史和原本》文库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已成为研究文艺复兴的教师和学生所必不可少的教材。从1962年起,加林便是刊物《文艺复兴》的主编之一。1988年我曾在佛罗伦萨拜访了加林。他十分赞赏中国的文化,并希望看到他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中译本问世。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一些中外专家和朋友的帮助,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龙华教授对本书进行了校阅,罗马的安娜·杜奇教授(Prof. Anna Pelle Tucci)协助我翻译拉丁文注释,梅利洛·温琴佐工程师(Ing. Melillo Vincenzo)在意文方面给予指导,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愿将此书献给一直鼓励我从事这一工作的李鸿卿姐姐。

李玉成

1991年4月于北京

序

本书于 1946 年写完, 1947 年首次由弗兰克出版社用德文在伯尔尼出版。当时明确的目的是想用通俗的语言, 向广大的非意大利语读者介绍 15 至 16 世纪之间意大利文化的某些方面, 特别伦理道德方面的情况, 因此, 我试图对十多年来的研究和阅读的材料进行综合——这是当时还采用的作法——有些材料在那时鲜为人知, 而今天已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熟悉了。

本书在 1951 年用意大利文出版时, 我又作了一些补充。为避免造成误解, 说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既不想通过此书造成一个对文艺复兴的新理解, 又不想对 15 至 16 世纪之间意大利的思想状况进行全面的论述, 而仅仅想谈及某些带方向性的问题。我认为, 人文学科(在这种情况下用了“人文主义”这个词)的兴趣, 首先为推动人们对“文明生活”的思考作出了贡献, 同时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对自然科学和普遍的现实问题产生了影响。为此, 我着重讨论了通常未被重视, 但从 15 世纪以来已不仅在“伦理”方面发挥着普遍作用的史料、作家、论题和著作。

尽管是暂时充当“普及”读物的作者, 本书也是我将近 20 年在意大利国内外, 也许更多是在国外, 对这一领域进行广泛研究的结果。现在环境和提出的问题都已发生了变化, 对本书所涉